

中共南昌城工部

纪念文集

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中共南昌城工部纪念文集

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中共南昌城工部纪念文集

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赣新出内准字第 0000425 号

印刷:江西南昌红十字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13.375 印张 37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序

蒋如铭

(1999年1月12日)

中共南昌城工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以南昌为中心,革命活动遍及江西许多市县的党的地下组织。南昌城工部在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斗争环境中,面对白色恐怖和流血牺牲的危险,按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在领导开展学运、进行军事策反、筹建武装、支援农村党组织,以及迎接南昌解放、协助城市接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南昌城工部的革命活动,是党在南昌奋斗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南昌地方党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今年5月22日,是南昌解放五十周年。为纪念这个重大节日,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印了《中共南昌城工部纪念文集》一书。该书作为1989年10月编印的《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的续篇,集中了近十年来南昌城工部史料征集、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的编印不仅充实、澄清了南昌城工部有关史实,使南昌城工部史料更加完整、翔实,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进行革命

目 录

在南昌城工部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宸禹(1)
进入江西·····	李 健(5)
南昌城工部的建立和断联与平反·····	程光荫(25)
南昌城工部历史遗留问题的由来与处理·····	聂兆霖(35)
南昌城工部被承认之后·····	喻以健(41)
望岗风云·····	张英荃(46)
地下工作回忆·····	罗和民(56)
新干一年·····	王石民(60)
萍乡特支迎接解放斗争史实·····	林增伟 彭江流等(72)
回忆温圳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何永龄 舒文烈等(87)
解放进贤回忆录·····	余子渊(98)
宜黄四个月·····	杨鲁平(105)
泰和地下党的一些活动情况·····	陈庆麟(108)
曹伟民支部革命活动情况·····	刘开树(115)
心远学生迎接黎明·····	熊大楞(118)
中正大学无线电学会的活动·····	喻士林(124)
萍乡特支上栗妇女支部工作的回忆·····	喻崇孟(127)
迎接萍乡城区解放的日日夜夜·····	卢晨阳(134)
萍乡中学地下党的活动·····	易洪鹄 胡荣凡等(139)
萍乡斗争点滴集·····	(145)
黎明前后在临川的斗争片断·····	傅锡寿(148)
温圳特支活动纪事三则·····	章广忠 陈传善(154)
难忘的六十天·····	肖希龄(158)
渡口脱险·····	周兆安(164)

在南昌城工部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黄康禹

同志们：

今天上午听了市委领导同志和这次会议筹备组同志的讲话，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南昌市委对征集南昌城工部党史资料是十分重视的，对征集和编写南昌城工部党史的指导思想也是十分明确的。它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立准立好的精神。南昌市委党史办和会议筹备组为开好这次座谈会，也花了很大力量和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作为过去南昌地下党的一员，深表衷心的感谢。

大家可能都已知道，一九四七年我和几位同志为了开展地下工作，从福建来到南昌。三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参加这次座谈会，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前一个月，南昌市委党史办给我打了二次电话，主要是征求我参加座谈会的事情，我当即表示只要身体健康允许，我是乐意接受邀请的。随后不久，李健同志也从北京来信，希望我能参加这个会议，他信上说，如果我的健康欠佳，可否出席几天提前回去。原定九日报到，我提前来了。

我所以一定要来参加这次座谈会，有三层意思：首先是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看望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并想通过在座的同志向南昌城工部的老同志表示敬意和慰问。第二，是想与参加会议的同志共同来完成南昌市委所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编写好。第三，对我们福建来的同志讲，是向江西省、南昌市委党史办学习。大家都知道，江西省是老革命根据地，南昌是八一起义所在地，党史资料非常丰富。江西的党史工作很有成绩，经验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并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最近中征委在北京召开了征集编写组织史会议，提出要写二个本子，一本叫自编本，范围是本省现在所辖地区的；一本叫上报本，按过去的系统编写，这就要请南昌市

委党史办帮我们提供资料。

我走出南昌机场，会议筹备组同志在车上就告诉我说，要我准备发言。我对这次发言考虑了很久，感到南昌市委党史办写的材料很好，很多材料都写了，要重复讲也无必要。今天我的发言，主要讲两点史实，提一点建议。

先说第一个，南昌城工部是怎么建立的。一九四六年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以后，中央领导刘少奇同志作了面示，主要精神就是六个字：“巩固、发展、提高”。在讲任务当中，提出福建还要继续发展，向浙江、江西、皖南方向发展，并指出这些发展不但是为了福建，而且是为了全国。曾镜冰同志从延安回来，路过苏北，陈毅同志又作了指示，他说福建的中心要放在闽赣边。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曾镜冰同志回到福建，召开省党代表会议，会上分析了江西的形势，认为江西从一九四二年大破坏以后没有党的组织，南昌也可能没有党的组织，如果一九四六年有党的组织，中央是会知道的，这次党代表会议开了二个多月，主要是总结福建省九年斗争经验，最后在布置工作时，省委作出了恢复江西赣南苏区决策，并任命我为赣南特派员。这个任务很重，范围很广，我们几位同志兵分二路，一路是我与蔡敏、池冲、陈鼎坤四个人前去赣南，一路是杨人屏、刘润世、何占向等三、四人去湖南醴陵。我们四人开头是跟着闽赣游击队一起走的，计划到闽赣交界处，我们再挺进到赣南兴国。但是走了一段路，由于敌人的进攻，我们过不去了。后改变方式，在将乐找到一个兴国老表，他同意带我去他家。随即我们以合法的身份于一九四七年五月间抵达兴国。六月间发展到泰和去，七月底，省委写信叫我回福建开会，我就在这时第一次到了南昌。当时目的是想找杨尊文同志，他是福建地下党员，因在福建站不住脚，到南昌来，当时我没有找到他，就打上海回福建省委去。

八月，在省委会议期间，我就向省委提出，要想把江西赣南工作开展起来，城市工作也必须开展起来，希望省里派一个干部到南昌开展城市工作。经省委同意，我与城工部庄征同志商量调李健同志到

南昌来,李因在福建比较暴露、转移到上海,掩蔽在上海邮局工作。我想李从上海邮局调到南昌邮局是比较容易的,庄征也同意了,最后通过曾镜冰的爱人孙竹云通知李健,大约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李健就到了南昌。李到南昌邮局报到后,于十一月初就来泰和找我,我们在泰和共同研究了开展南昌城市工作的意见,李即回南昌去了。我第二次到南昌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当时曾镜冰写信叫我回去开会,我路经南昌与李健研究了城市工作,李健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搞了一个工作方案,确立先从正大人手,我同意了他的设想,然后我就回福建去,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再回江西了。刚才上面说的这些由来,主要有三个意思:一、南昌城工部是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二、南昌当时的工作是由李健负责,他刚到南昌时任南昌特派员;三、南昌城工部这个组织是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成立起来的。

第二个,福建省委城工部是怎么解散的。这件事大家是很关心的,这里只能简要地讲一下,因为情节比较曲折,要详细讲得要花些时间。事情发生是这样的:一九四八年一月,我从南昌回到福建省委机关,在准备开会的过程中,三月中旬福州送来一些紧急的消息,告诉省委说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从宁德回福州的路上突然“失踪”。阮英平抗战以前在福建打游击,抗战爆发北上抗日,一九四七年四月中央华东局派他回福建负责军事工作。一九四八年三月,阮带一位警卫员化装成商人,从闽东回到省委,在路上找一个人家住宿。解放后在复查这个案件时,才知道这家人曾搞过经济土匪,认为阮英平身上带有黄金,第二天警卫员出去买东西,哄阮英平说,有国民党兵要来,要他跟上山去躲避,将阮英平打死谋财害命。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只听阮英平警卫员说的“失踪”情况,但他也说不清原因,因此认为警卫员有问题,由这牵连到省委城工部部长李铁,在“逼供讯”的错误指导下,认为城工部领导层有问题,搞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省委组织审查委员会,错杀了城工部一百二十七名人员。这个事情处理后,省委在四月开会,五月一日通过《决议》,作出解散省委城工部的决定,割断与城工部的联系。

省委会议结束后于五月中旬派了一名交通去蔡敏那里,传达《五一决议》精神,并交代说凡由福建去的城工部人员都要审查。在江西也错杀了五位同志。一九五二年,福建省委复查了城工部的案件,把过去强加城工部头头的罪状,一件件予以澄清。事实证明阮英平同志不是被他的警卫员所出卖,而是被那个谋财害命的土匪所杀害。其他都查清了。一九五六年经中央批准福建省委发出了关于城工部问题的平反通知。

上面所说的解散城工部的情况,其主要意思是想说明,省委处理城工部的错误是严重的。省委要负全部的责任,不应责怪执行的同志。我们党史应该很好总结这一沉痛教训,同时也应该指出,城工部的许多同志和群众,他们受了许多委屈和不幸,但他们始终坚持革命,表现出很高的觉悟。我想这种精神,也要载入史册。

最后讲一点建议,南昌市委党史办编写的这个材料,我看后觉得编得不错,提不出什么意见,因为我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已经离开江西,主要情况还是靠李健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去提出。不过,我在这里提一点建议,在写南昌城工部党史时要总结一下学生运动经验,材料是说到一九四六年以正大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为南昌建党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九四六年的正大学运,我看南昌城工部的发展就不会有这么快。再总结一下李健一个人到南昌后,发展到这样多党员、这样大的地区,这里有不少经验。还可总结一下城工部事件发生后,他们是怎样独立作战,我看这是很宝贵的经验。通过这次会议,总结我们的经验,来激励我们自己,激励同志,激励后人,为改革、为振兴南昌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再一次让我向市委、全体工作同志表示万分的感激。

(编写按:黄宸禹同志是原闽浙赣区党委委员、赣南特派员,本文原载《南昌城工部党史座谈会会刊》)

进 入 江 西

李 健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接受中共闽江工委的任务,在福州筹办“六艺书店”,任经理。1946年8月内战扩大,形势恶化,书店活动受到敌人监视,工委指示结束书店,转移人员。10月我到了上海,工委书记庄征指定我与福州市孙道华书记保持联系。在沪期间协助工委委员杨申生工作。1947年8月收到孙道华来信,他说庄征要他转告,省委^①调我赴江西工作,详情将派人通知。八月中旬,孙竹筠^②来我住处,她说,省委派你去江西负责城市工作,由黄宸禹^③领导,他有信给你,又说初到江西需要一个掩护职业,组织可帮助解决,问我有什么困难。江西,对我是陌生的,但我服从党的工作安排,那里有需要就到那里工作,老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的老领导,信得过。考虑之后我说准备去,但闽江工委在上海、南京、杭州还有几个点,走后交谁联系?我介绍了上海法学院甘群光、陈国琛,南京边疆学校万木、张洪椿、费成信等,杭州邮局李兆杰、江珖等同志的情况,她说等她和上海地下党联系后再决定。上海地下党派干部来作了详细了解,他们回去研究后决定上述各点仍由闽浙赣党联系,他们不接收。孙说等到了江西和老黄研究看看江西是否还需要调入一些人。赴赣前我介绍刘朝绅、陈宗珪^④,郑孔佩三同志到福州市委工作,孙道华接上他们的关系。1947年10月,我把上海私人住房顶租出去收回黄金三两,准备带去江西作为地下党经费。走前和上海邮局地下党员周清泉告别,约定今后仍请他寄党刊《群众》^⑤到江西,和东南日报编辑、地下党员陈向平告别,请他介绍江西的进步青年与我们联系。10月中旬经九江到南昌,通过关系安排了掩护职业,在江西省邮政管理局本地股当一名分拣信件的小职员。这是内部工作,分日夜两班轮值,时间机动,便于外出联系,进行地下工作。工资收入可

一半维持生活，一半作为活动经费。在南湖路灵应桥一号邮局宿舍三楼分配到一间九平方米小房间，就作为个人的秘密据点了。

按照老黄信上开出的联络地址及暗语，我写信到泰和县城中山路联络点，黄回信指定时间让我到泰和县汽车站会见。11月初我到泰和，有六年未见面，但彼此仍认得出来，当天下午我们走四十多里山路到郊区一个小山村，等天黑潜入山坡上一间小草房，里面堆放着稻草和农具，他说附近村子有一个地下党支部掩护他在这里住几天。我们动手弄晚饭吃后，把火扑灭，坐在草堆上轻声交谈，不时停下来观察屋外的动静。他当时是闽浙赣区党委委员、赣南特派员。我向他报到，作为捐献把随带的三两黄金面交他，他收下了。他扼要介绍说江西、浙江两省委被敌人严重破坏，只福建省委坚持下来了，现已作了九年斗争总结。他说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向江西、浙江、皖南、台湾、湘赣边等处开展工作。这次他和几位干部从福建出发进入江西老苏区兴国、于都、泰和等县。调我来江西是他和庄征^⑥商量，经庄征同意，上报区党委，经同意后，请孙竹筠在上海向我传达的，他说组织上派你去南昌，任特派员，负责重建南昌及江西各城市地下党组织（以后称为“南昌城工部”）。当时他布置的工作任务有：（一）开展城市群众反蒋民主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党中央、毛主席高度评价蒋管区学运，称之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二）城市工作为农村工作服务，要培养干部到山区工作，动员经济、物资枪弹、情报等支援山区；（三）搞好统战、策反工作，筹建武装。第二天我们走了二十多里去参加一次农村干部会，有十多位农民到会，老黄讲了解放战争形势，农村工作任务，秘密工作注意事项，然后分组讨论。当晚我们回到原处过夜。天亮后，老黄开介绍信，交给我两个从闽江工委调江西工作的党员（杨尊文、张玉麟）的组织关系。还介绍我与南昌中正医学院女生肖玉英联系。至于南京、上海学生党员调赣工作，他说考虑后再决定。他交代今后南昌工作由他单线领导。黄派人带路送我到泰和县城返南昌。

“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1930年后成为蒋介石五次“围

剿”革命力量的大本营。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南昌设“绥靖公署”继续“清剿”留下的少数红军游击队,屠杀了上十万名的革命者。抗战初期,艰苦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南昌及江西各地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皖南事变后,1942年反动派又大肆镇压,地下党江西省委组织被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影响下,1946年底南昌市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抗暴、反美示威游行,冲破了反动派多年的禁锢、压制,江西群众反蒋民主斗争进入了新高潮。1947年2月,国立中正大学(简称正大)学生开展反饥饿、求温饱,反迫害、争民主、抢救教育危机的护校运动,持续到6月,其间“五·二一”请愿示威,八百余名学生与封锁赣江桥头的二千余名军警宪特英勇搏斗,震撼了全省。当时南昌的学运是在全国学运形势和上海学联的影响下进行的,带有某些自发倾向,在积蓄力量、巩固发展,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方面还不够成熟。我回到南昌后几个月,查阅了近几年的报纸报导,与学生、工人、职员、一般市民进行接触、交谈,思考着江西城市地下党工作应从何处突破?从工人、职员中建党,还是从进步学生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中开始建党?按照一些同志的传统概念,必须从工人开始建党,但南昌是中等城市,产业工人很少,手工业、店员较多,公教人员及中小学教员也较多。因为他们很分散,与我党长期失去联系,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黄色工会的政治欺骗,有政治觉悟的工人职员很少、自发斗争少。如果我们外来干部花一、二年时间接触工人,进行思想工作,也许能培养一些积极分子,吸收几位工人入党,起到“点”的作用。但“面”不宽,工作意义及政治影响不大,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不能开展,城市工作不能突破。因此,我们只能从江西的白区的实际情况和工作要求出发,不囿于传统概念了。开展第二条战线可以达到从政治上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分化瓦解敌人的后方,有力的支援解放战争;而且我们需要一批本省的革命的知识青年到各县去,到工农群众中去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桥梁作用;他们和江西各阶层有

联系,许多迫切的工作如宣传、统战、策反、情报、筹款等需要他们来做。由于以上考虑,我们决定从学运开始,取得城市工作的突破。正大集结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学生,是一块能够发动第二条战线斗争的阵地。地下党必须和他们团结在一起,长期地巩固这块阵地,通过群众斗争培养一批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再派到各县去工作。当时就是想选取正大为“突破口”。

回南昌后,寻访过杨尊文,他寄居在他福建同乡又是老师郑岚夫家中,郑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供应局中校参谋,思想开明,杨久等联系,生活无着,经郑介绍,他到遂川县大队当上士文书。考虑到南昌工作一时用不上他,留在遂川还可能争取地方武装,就让杨暂留遂川。到过临川县寻访张玉麟,他回赣后看到、听到江西的白色恐怖,可能是动摇了,避不见面(以后把他清除了)。也走访了肖玉英。看来一时还无法打开联系进步群众的途径。我打算到上海,通过熟悉的地下党关系寻访赣籍在沪的进步学生,通过他们介绍省内的进步同学。

1948年1月底老黄来南昌,住在我宿舍中,我汇报了工作情况和打算,他同意我提出的开展城市工作的计划,他一再查询是否有一个女同志自福建来南昌。(我那时还不知道他的爱人魏雪馨同志要在1月底调来江西工作。不幸她于动身前几天被敌人逮捕,1948年8月牺牲)。此行,黄还计划用那三两黄金购短枪带回赣南。杨尊文不在南昌,黄要我直接去做郑岚夫的工作。我们估计郑掩护过杨,不致于出卖我们,为了慎重起见,每次我赴郑处联系时都请老黄暂离宿舍,等我安全回来,在窗口做个信号,他才可以再进入。郑说目前购枪有困难,但表示和我谈论时局、战局有兴趣。此后,我把郑作为统战对象,时时送革命书刊去并和他促膝谈心,时间长了,郑向我透露说,供应局内部设有军统特务、谍报机构,他和那些人熟悉,有什么消息可转告。以后他常常把敌特注意江西、南昌何处、何单位、何人的情报转告我们参考。1948年8月,有一次他写了“黄康禹”三字,他说中间一字他不会念,全省特务奉命搜索此人。他用疑惑的眼光望

着我,以为我就是黄宸禹,劝我暂避一避。我说,我们没有这个人,情报有误,但不论任何情报希望他尽量提供参考。回来后,我写密信给老黄报告,(老黄于1948年2月返福建)。解放军渡江以前,郑主动整理了一份《长江以南弹药粮秣库清册》,约四十页,有详细地址、品种、数量,交给我,他要求不用电台发,说电波有监视,可派人送,我同意。这是他向我党我军靠拢,主动提供情报,表示自己心愿的一次实际行动。可惜,我们和区党委已经断了联系。情报送不上去。以后才将部分内容向渡江进入江西境内的解放军报告。

1948年1月,黄在南昌时,我刚好收到上海孙竹筠的密信要我转交黄,黄用药品化读后说省委召他回闽,有事商量。我问福建出了事吗?他说可能是重要的事,庄征有问题。^⑥我说我也要上海找一些进步关系回南昌来开展工作,他同意我们一起去上海。在沪期间我们住在他哥哥黄宸贵家中,我又提出调沪、宁学生党员和进步群众入赣工作,他同意了,他按我提出的名单,写信向蔡敏介绍:甘群光、陈国琛、万木、张洪椿、肖寒、赵明、肖光宇、陈康、黄肃宁、郭岸、费成信、何莹、熊荒陵、戴强夫等人,他们以后分批进入湘赣边山头。吸收宁、沪进步学生入赣,是有远见的决策,他们以后成为湘赣边工委的骨干。我托人买了飞机票送黄回福州。

1948年2月初,通过陈国琛找上海学联委员,江西人徐思捷,他介绍了正大学生罗和民;陈向平介绍正大学生刘仁勇(即诗人公刘,我返南昌访他时,他已被开除离校未见到);上海交大地下党员陈明煌介绍黄肃宁;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员潘静伯、万家良介绍正大学生万家耀。

2月底,我带陈国琛和肖寒由浙赣线返南昌。我派陈国琛带介绍信先上山找蔡敏,(蔡敏系统的地下党组织,解放后经他上报江西省委,批准称为“湘赣边工委”)以后陈就作为交通陆续把到达南昌的各批宁、沪学生带入湘赣边山头。我访过罗和民(当时常用化名周仁、陈德仁),罗以后介绍王石民、陈庆麟与我会见,我们经常一起学习上海带来的革命书刊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政府已

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以及《群众》上的其他文章。4月,罗和民首先写自传申请入党,接着王石民、陈庆麟也写了自传申请入党。当时我们手边有七大党章,党章上有这么一条:“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组织章程另订之”,也就是说由于白区环境的特殊性,地下党章程应允许和解放区执政党有所不同。地下党员入党时都是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不交给小组讨论、支部大会通过。入党时要写自传或申请书,填交誓词,经批准后组织以书面方式或口头对申请人宣布,指定候补期(一般一年或半年,表现好可提前转正)。在险恶环境下,自传上可不用真名,甚至口头申请入党也应当允许,所有书面文字领导人阅后即焚。1948年4月,罗、王、陈组成正大文法学院党小组,王石民任小组长。党小组的任务是学习、调查研究、联系进步同学、宣传党的学运方针政策、培养发展对象。陈庆麟是进步的学生自治会的理事、总务部长,要求他办好总务全力支持进步学运。

1948年2月,我到万家耀家联系。万参加过国民党军入缅远征军,曾应聘充当英语翻译(旧称译员,不是政工、特工人员,译员不用时即解聘),没有反动行为。后考入正大,受进步学运影响参加进步社团“海燕读书会”,参加历次进步学运。“五·二一”请愿时任纠察队员与军警英勇搏斗受重伤,1948年7月被开除学籍,失学失业在家。经过半年多教育、考察,万家耀申请入党被接受。

江西反动派为了防范青年人“赤化”、“匪化”,采取先入为主的政策,诱骗青少年、中学生集体填表加入反动党、团组织。有的人为谋生求职误入歧途,填表参加反动党团组织。但他们没有反动行为,与反动派并不保持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系,长大后,受我党影响,思想觉悟,毅然参加反蒋斗争,其中有的人经过考验后加入了地下党,这是白区环境的特殊情况。地下党应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历史和思想转变过程,给予区别对待。南昌地下党,90%以上是大中学生和青年教职工。地下党中有一位由罗和民介绍入党的陈露芷,他是江西省公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按国民党体制,其职务相当于机关支部书记,无实权。我们按党章办,他的候补期定为三年,由罗和民单

线联系,专搞情报及调查工作。解放前夕,他为省公路局保护汽车及器材,做了不工作。除陈之外,南昌地下党没有其他政历复杂的党员。

1948年4月,正大进步学生自治会副主席李国麟在校园张贴文告讽刺蒋介石当选伪总统。这是一次“硬碰”斗争,从策略上看,对进步力量不利,平时四分五裂的校内外反动派,这时为了表示“效忠总统”,一起勾结起来,向进步力量反扑,逮捕和开除进步同学一百多人。地下党需要与学生中的进步核心打通联系,帮助疏散一部分同学到外县去,能够留在学校的,希望转入隐蔽活动,保存有生力量。在党小组研究时,我们决定由陈庆麟出面与学生自治会理事、“海燕读书会”骨干林增伟联系。林要求与地下党负责人见面谈谈,我表示同意。林在学生运动上有实际经验,对时局和政策学习很努力,预计将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和林谈话前,我认真地做了准备。自到江西以来,区党委还没有发下一份文件,只有上海周清泉按期寄来党刊《群众》。此外,我利用掩护职业之便直寄美钞到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开出通讯地点,购寄一批革命书刊、小册子(包括新华社对解放区工作及蒋管区民主斗争的有关社论、评论、报导及述评等,指导意义很强)可作为分析时局、形势及方针、政策的依据或参考。(1948年10月起还指派黄铭勋收听纪录延安、邯郸广播)这些资料,我是经常认真学习的,还思考过留校的和离校的进步同学,今后如何开展联系和工作。和林增伟作过三次交谈,对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按党的白区工作总方针,谈了自己的意见,和他建立了共识和信任。不久林写了自传入党,他前后介绍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如单发喜、李绳祖、王镇邦、张自旗(《中国新报》编辑)、陈汝修、王庆霭等,通过他们又吸收黄景祚、黄治、余立毅、黄济凡、刘天锡、范拯球、夏咸淇、周泽霖、李毓昌、朱炯开、徐远定、杨小春、李龙启、邹宜儒、聂兆霖、杨鲁平、邵荷春、晏政、胡德民、雷良钧、熊国模等入党。从此,南昌城工部地下党逐步恢复和扩大了和江西各阶层群众的联系。由于地下环境的限制和我们工作不得力,有几批进步学生离开江西到外地或解放区去了,

曾经派万家耀专程赴沪挽留他们回江西工作,但没有成功。萍宜醴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集中有煤矿工人,我们派去的林增伟、王镇邦、胡道臻、易成等与当地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因此,这一地区作为城工部在南昌以外的重点地区,设立萍乡特支,领导工运、武装斗争,指定《华南人民武装行动纲领》作为指导性文件,这是刊登在《群众》上的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审定的文件,是我们当时能看到的唯一一份指导性文件。另外,我还起草了4次书面指示(现保存于萍乡档案馆)。已毕业、离校的党员罗和民去新建,王石民去新干,陈庆麟去泰和,其他党员,杨鲁平、聂兆霖去清江、龚成余去武宁,范振球去兴国,刘天锡去吉安,单发喜在正大中学、欧阳占乾在江南中学、张自旗、聂轰在中国新报社……。

1948年9月,“李国麟事件”后的正大,进步同学100多人被开除,12人被警告,颁布《训导法规》,解散、禁止进步社团活动,张贴墙报要审查,3人以上集会须批准,有的宿舍还安插反动学生监视。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组织5位学运骨干分别写出学运工作总结,在此基础上我起草了《上学期正大学运总结》,复写传阅。这是试图用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指导正大学运的文件。文中提出了近期学运总方针:巩固学运,改变作风,加紧团结、加紧学习,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形势变化。在斗争策略方面提出要“合法”与“不合法”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要通过一切可能方式坚持为群众服务。按照上述方针和策略,我们很快地扭转了不利局面,巩固了学运阵地,克服了自发倾向,纠正了“左”的作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奠定了学运的广大群众基础。

1948年10月成立“南昌学生运动(工作)委员会”,由李健、李绳祖、单发喜、万家耀组成,(12月增加张自旗为学委委员),作为学运的学习、研究、决策及协调的机构。在校的地下党员仍保留原有的点、线关系。以后为了隐蔽、精干,学委会停止开会,改由我分别碰头商量工作。同月,正大地下党小组成立,后扩大为第一支部,支部干事会由李绳祖、黄治、黄景祚、余立毅组成。当时学委确定的新方针